

# 日治時代小說中的教師形象

尹子玉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）

## 摘 要

日治時期的眾多小說當中，有不少關於教師的描寫，對這些文本進行彙整分析，重塑日治時期的教師形象和教育狀況，並與實際歷史文獻記載對照，呈現殖民社會，以及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社會下，教師所面臨的種種問題。

將日治時期教師分為傳統與現代、日本籍與台灣籍、男性與女性三方面探討，亦即對時代變遷、國族認同、性別問題進行分析，而此三方面在殖民社會下息息相關的緊密連結，也是本文焦點所在。

關鍵詞：日治時代、臺灣文學、教師、小說、皇民化

## 壹、前言

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之人。日治時代的教師所傳之道是儒道？大和道？還是自由心證之道？用什麼書？授什麼業？自己的迷惑尚不能解，卻必須成為下一代的解惑之人。小說家從真實之中取材，灌注自我的意念，揉合成反應社會又同時張揚自我的作品；藉由小說本文的分析，試圖將現實、虛構、以及受局勢限制無法展現的部份加以解讀，將日治時代小說中的種種「教師形象」勾勒成形。

### 一、取材範圍：

本文所討論的文本，只限完成於日治時代的小說作品，包括中文以及日文作品，戰後書寫日治時代的作品不在參考之列。清查目前已出版的小說全集、選集（詳見參考書目小說集類），共查出六位作家 14 篇短篇小說（見附錄）內容述及教師形象。

### 二、作家與作品的關係：

以教師為書寫對象的諸位作家當中，只有呂赫若一人有教師經驗。自身留日時期對音樂教師的印象、師範畢業後被分發到鄉野教書的格格不入之苦，都是呂赫若的小說素材。

其他諸位作家之所以取材教師，部份與家庭關係、學習經驗有關，王昶雄取材自身的求學經驗，以體制中的教師作為描寫對象；楊守愚的父親是清朝秀才，父親或父親的交遊之中有不少塾師，因此他雖然認為傳統書房教育已跟不上時代進步，甚至會阻礙社會發展，但對書房先生所面臨的種種苦困，他頗能同情體會，因此，除了藉訕笑諷刺抒發自己對傳統教育理念、教材、教法上的批判，他也描寫傳統塾師的孤困無奈，甚至試著為他們找尋出路，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裡面對文學家的憧憬，〈夢〉裡對大陸學界的關注，都交錯著塾師築夢、幻滅與現實的殘酷。

張文環的寫作靈感來自童年在私塾和公學校的求學經驗，〈重荷〉、〈論語與雞〉裡都有對公學校師生帥氣制服的偏好，13 歲後才入公學校的張文環，從他的〈論語與雞〉之中可以看出他就讀私塾時對進入公學校充滿渴望，也對穿著帥氣官服的學校教師滿是崇拜。也許是因為傳統的人情事故的關係，他對塾師、私塾教育的批評其實相當含蓄。

一吼的作品，由他的批判強度來看，不僅僅是幼年經驗，還包含著一些個人因素，對那些傳統道德家有明顯厭惡與鄙夷的意味。

朱點人曾在學校擔任醫學研究助手，他所描寫的女教師，在病榻之上回憶並悔恨流逝的感情，應是作者以其工作經驗和見聞，融入自己的戀愛經驗，以男性作家的身分模擬病中女子的細膩思緒。

本文以二元對立的概念，將小說中的教師角色分為：現代教師與傳統教師、台

灣教師與日本教師、男教師與女教師；共三項六類展開討論。

## 貳、現代教師與傳統教師

從新舊文化對立的觀點，將教師分為現代教師與傳統教師。所謂舊文化，指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思想；新文化則包含著日人帶來的現代化思想，新式學校，以及受中國、日本現代文壇影響的新文化思想。

### 一、傳統教師：

以傳統書房先生為題材的作品相當多，共有八篇：楊守愚的〈捧了你的香爐〉（出版年 1929）、以及一系列的〈開學的頭一天〉（1931）、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（1931）、〈夢〉（1931）、〈啊！稿費？〉（1931）、〈退學的狂潮〉（1984），一吼〈老成黨〉（1931），張文環〈論語與雞〉（1941）。小說裡對書房先生的描寫都是傾向負面形象、負面情感，以社會觀點進行批判。

#### （一）傳統文化代言人

楊守愚〈捧了你的香爐〉用「新民」和「尚古」兩位教師的辯論當主題，「尚古」先生代表傳統文化思想，主張教學必以四書五經為宗，講究道德禮教，以打罵輔助教學，極端反對「新民」先生主張的新學說、新思想。楊守愚將「尚古」先生描寫的固執而食古不化，嘴巴上掛滿教訓，自己跟不上時代的腳步，卻埋怨時勢不合古，完全不講道理，對新制度極度情緒化，這些負面的形象描寫，包含著嘲諷和鄙夷，易使讀者對「尚古」先生起反感，而這些反感都投射在「尚古」所代表的舊

傳統上；小說最後，「尚古」先生氣沖沖的對「新民」先生落下狠話：「我劉尚古勢必捧了你的香爐!...」，雖然情結到此便沒有交代，但是觀者都很清楚，最後將是「新民」革命成功，捧走了「尚古」的香爐，而不是「尚古」捧了「新民」的香爐。

被捧走香爐的傳統文化該如何走下去呢？楊守愚有一系列以私塾王先生為主角的小說，〈開學的頭一天〉、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、〈夢〉、〈啊！稿費？〉、〈退學的狂潮〉。之中的〈夢〉便試著替傳統文化尋求變形的出路，夢中王先生接到上海留華學生會的邀聘，任文藝刊物編輯，與文壇大家如魯迅、鄭振鐸、冰心、郭沫若、郁達夫等人相會，成為時髦的文學作家。在書房裡只教四書五經等傳統學術的王先生，在前往上海的船上想的卻是：

廣大無涯的世界呀！這才第一次教我們的文學家認識了宇宙的大觀，汪壯的詩思，潮一般地，在他底心裡翻騰滾湧（註1）。

即使是吃孔子飯的私塾先生，也能接受新文學思想，就像魯迅、鄭振鐸等人，同樣也是從中國傳統的底子上前進，卻能成為一代新文學巨擘。王先生以塾師的身分，青澀不成熟的筆鋒嘗試文學創作，孺慕大陸文壇大家、憧憬新文學的情結讓他做了好夢，台灣能否走著祖國的路子，開創台灣的新文學呢？身為台灣傳統文化代言人的王先生，只能從夢中醒來。

### (二)表裡不一的假道學

一吼〈老成黨〉，描寫滿堂四書五經，滿口仁義道德的私塾先生們，時常聚集

上妓館、酒家，吃喝嫖賭，歪解經典，甚至在妓館理討論組織「道德維護會」，以對抗當時的「改革」空氣，並斥「新道德」、「活文學」是文妖、盜賊。

作者以極度諷刺、誇張的筆法，將這群表裡不一的假道學家，摹寫得面目猙獰，好色不堪。

張文環〈論語與雞〉，則是藉書房學童的眼睛，描寫書房的上課情形、家庭生活和行為，相較於一吼的誇張諷刺，張文環只是淡淡的述事，以孩子的思想發出疑問，含蓄的抒發其對書房先生表裡不一的不滿。小說裡形容書房的上課情形：

先生一天用筆點四次教你讀。這就是「授書」。...先生睡眼惺忪地落坐，一面啜飲一面抽一筒煙（註2），...先生時而出門飲酒聊天看熱鬧，將一班學生留著，書房頓時成為沒有人管的遊樂場。也提到先生的家教問題，先生對學生百般嚴厲，但是對自己的孩子卻十分放縱，抑或是無能教導，愛讀不讀都無所謂，也可以睡得晚晚起，讓主角覺得「沒有道理」。

最後先生在一場紛爭裡，當著村人的面，拾走咒誓作祟而斬掉頭的雞，「...眾人把先生留下，急步下山走了。阿源感到一種幻滅的悲哀，也覺得阿嬋太可憐了。她有這麼一位齷齪的父親，而他自己也有這麼一位先生，這是多麼窩囊的事（註3）。」咒誓雞成了先生加菜的盤中物，不久之後，學生們一個個輟學離開。

### (三)社會變遷的犧牲者

不單是新舊文化間的衝突，政權交替、制度改變、經濟結構複雜，種種的社會變動都會造成犧牲者，從教育體制改變、

經濟蕭條的社會層面看傳統教師的生活重擔。

楊守愚的〈開學的頭一天〉裡傳統書房在新式學校的競爭之下，開學頭一天書房先生卻得面對無學生的窘境。或許是因為時局的關係，小說裡並無明書社會環境的問題，只從書房先生的落魄醜態寫起：

油漬片片的藍布長衫，和那打滿無數通空氣的小洞底灰色氈帽，王先生這麼驚喊著，呆呆地，又像這一副倒霉的衣帽，在預兆著前途的黯淡似的，使他頹然（註4）。

社會變遷與經濟不景氣的雙重壓力，將傳統塾師逼得無法討生活，只得待在無人的學館裡苦等公學下課；想束脩想到焦急不堪、醜「思」盡出，只好自我安慰：「...到公學校放了課，差不多兩點鐘，哈哈！兩點鐘一定會來的。」

接下來的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、〈啊！稿費？〉、〈退學的狂潮〉描寫書房「生意」冷清，門可羅雀之後，王先生驚覺「孔子飯再也吃不得了」，在家庭經濟壓力下近乎崩潰，突發異想嘗試文藝創作，希望能像他所欣羨的蕭伯納、菊池寬一樣，成為時髦作家賺取稿費，結果從交稿到領取稿費，拖了兩個多月卻只賺了十元，教了半年書，束脩還沒全拿到手，學生退學就達三分之一以上，面對無情的現實環境，王先生在對世間的悲憤中幻滅，思索「世間的錢，又是歸到誰的手裡呢？」。

曾經被作者塑造成打擊對象的傳統塾師，在這幾篇作品裡變為被壓迫在社會底層的小民，不僅受經濟恐慌之苦，連學生也被新式公學校搶走，最後一線做文學家

謀生的希望也遭幻滅，成為社會的犧牲者。

## 二、現代教師

這裡的現代不僅是日人帶來的「新」學校教師，還包括作家所虛構的「新」私塾教師，現代教師的特質是進步的、不同於傳統的，從新人類的眼光來看，是時髦閃亮的代表；從舊社會來看，卻是叛逆背道的惡徒。選取的文本包括：楊守愚的〈捧了你的香爐〉（1929）、張文環〈重荷〉（1935）、呂赫若〈藍衣少女〉（1940）三篇。

### （一）新文化的代言人

相對於前面的傳統文化代言人，楊守愚將〈捧了你的香爐〉中「新民」先生同樣設定成私塾教師，然而他的思想卻是現代化的，一心改革傳統教育，希望私塾的教授方式更貼近時代，鼓勵男女平等，打破階級意識，將不合時宜的舊道學淘汰，謀求新時代自由與幸福。楊守愚對「新民」先生的描述十分正面，總是沈靜穩重，按自己的步伐，勇敢向前邁進，以理性的態度回應「尚古」先生歇斯底里的叫罵；如此的教師形象塑造，清楚表現出作家欲打倒舊傳統、追求新文化的意圖，從角色名稱、身分設定，以及「新民」先生的理念陳述，可以明顯看出作者深受中國五四新文化、新文學運動的影響，作者希望在台灣也能藉由教育產生新文化、新文藝，而這些新品種是從中國的根底開始改變，不是被日人連根拔起，這位代表新文化的「新民」先生，是自發改變的私塾教師，不是受日人師範教育養成的「先生」。楊守愚另外三篇小說：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、〈夢〉、〈啊！稿費？〉則描寫

主角對歐美、日、中西文學大家的欣羨之情。

### (二)閃亮神氣的大人物

日本新制度之下，學校男教師都穿著白色的文官服，一方面增添教育者的威儀，一方面也提醒教育者打起精神。張文環〈重荷〉透過鄉下窮孩子建的眼光，形塑那些穿著官服的教師們：

老師的金質杓形肩章在陽光下閃閃發光，連腰際的佩刀也燦然生輝。...

老師有一次指著身上的佩刀，說：「你們看這個，肯用功的人就可以獲得這份榮耀。」...

啊！那金質肩章、那金色的紋理，建摒住呼吸，竭力避免扁擔下滑，脫帽向陳老師行最敬禮。那樣畢恭畢敬就宛如自己是偉大人物的僕人。一雖然警察先生也佩掛肩章，可是那花紋卻有點像拉麵，而且老師的肩章要看起來閃亮、神氣多了（註5）。

白色的文官服，配著肩章、短刀、帽子等裝飾，讓一個教育者充滿朝氣和自信，深深以自己的職業為傲，以身著制服為榮耀，教育家的特殊性質，較其他官服階級的警察、公務員更予人一種高貴感；和私塾教師隨經濟能力而製的服裝相比，制服成了現代紀律與精神的代表。

### (三)落後社會的犧牲者

有社會變遷下的犧牲者，也就會有「不變」社會下的犧牲者；年輕的知識份子走在時代尖端，將社會拋在腦後，進步的社會又將跟不上時代的人們拋下，然而，最後的犧牲者卻並不一定是那群被拋下的人。呂赫若〈藍衣少女〉中，便刻畫著被落後人群犧牲的新知識份子。偏遠的山地

村莊，一位以繪畫藝術做為生活意義的公校教師，以女學生為模特兒，製作一幅名為「藍衣少女」的油畫，結果招致村民反感，將畫作偷出當成「誘惑少女」邪念的證據，一狀告到校長面前，當教師辯解，以學生為模特兒並無惡意時，校長回答：「...台灣的文化水準低落，你最好死心，像個教育者來道歉吧！（註6）」一語點重台灣文化的要害，即便是新知識的教育者，也最好能識時務，否則只能成為落後社會的犧牲者。

作者傳達教師被誤會、偷畫而興起憤怒，在校長和現實的壓力之下，憤怒轉為悲哀，怨艾自己卑微的「教員」、「畫家」身影，被「教育者」的龐大招牌壓制，藝術靈魂被權力社會折辱翻弄，「逐漸覺得自己像隻無力的小動物，感到遠離文化的山村人們充滿如堅壁般的偏激。自己更加可憐（註7）」於是悲哀又嘆為無奈，只得向野蠻無知的村人低頭道歉，在幾近崩潰的情緒下而毀滅畫作。

### 三、小說與現實的對照：

#### (一)有關傳統教師的紀錄：

從日人留下來的資料，可以找到許多關於私塾教育的相關紀錄，在一些台灣名人的回憶錄裡，也可以看到他們對私塾上課的記憶，拿這些紀錄與小說對照，所有私塾教育壞的部份、以及塾師的負面形象都曾被當成小說材料，但是一些正面的形象、較好的記憶，以目前的資料來看，似乎都沒有被日治時期的小說家借題發揮，只有在戰後的作品裡，才有對塾師正面的小說書寫（註8）。

1. 《台灣教育沿革志》裡記載日人實際視察傳統書房的上課情形與張文環〈論

語與雜〉裡的描述雷同：

...教授時間似乎總得從早上到傍晚，課堂毫無紀律可言，沒有固定作息時間，教師邊上課邊含著煙管，學生也或抽煙或吃東西，到處嬉戲笑鬧，真正上課的時間其實很少（註9）。（尹子玉譯）

而書房的教師來源更讓日人詫異：

書房教師的資格有貢生、廩生、生員、及童生，有些則是單純的讀書人，沒有經過任何考核檢定。清朝政府對於教育諸事都採放任態度，惟獨對考試之事大予獎勵，因此無資格的教師充斥，是該社會的大恥（註10）。（尹子玉譯）

2.張深切的自傳性作品《里程碑》裡有詳細描述幼時上私塾的經驗，也與《台灣教育沿革志》的觀察報告十分相似，張深切最初的先生是位秀才，教書嚴格認真，然而學塾教學卻有很嚴重的問題：

學塾的設備很簡陋，既沒有黑板，也沒有所謂教壇，連老師的床也設置在教室，...。上下課都沒有時間表，除吃中飯以外，整天坐在暗淡的教室唸書，唸到天黑，瞧不見了，才算下課。老師把書裡的字，用「紅硃筆」點點紅，唸幾遍給學生聆聽，就算教學。

我們自「上大人孔乙己」起，至四書五經，所唸的全是很深的學問，...，有的字義，恐怕連老師也咬不破，彼此不求甚解，...，換來了一位姓施名梅樵的老師，...他的教學不嚴，教室常鬧得沒秩序（註11）。

混亂的教學環境、素質參差不齊的私塾先生、不人性的教學方法，學生花了很長時間在書房唸書，卻學不到什麼知識，如此低效率的教學，中國人之多年而不

自覺，但在日人引進現代化學校之後，學校成為有組織有效率的教育機構，配合科學化、人性化的教學法，目標明確的教育理念，家長與學童們才意識到傳統書房的問題所在，家長察覺到與其讓孩子在環境不良的書房唸書，還不如上日人的公學校，學童在經過新式教育洗禮之後，也開始省思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學習經驗。於是私塾被新制學校逼得日益減少（註12），最後在1943年遭到廢除的命運，蛻變為小說家的舊學童們，則借用自己的書房經驗，作文反省、批判傳統文化的種種問題。

3.在《吳三連回憶錄》裡，吳三連對幼時的私塾經驗留有較好印象，但因時間久遠記憶不清，再加上時間很短，私塾很快就被日人取締，因此記載十分簡短：「我讀四書讀得很有興趣，老師也很認真地教學。」（註13）

（二）關於現代教師的紀錄：

1.《台灣教育沿革志》裡有完整的教師相關法令以及教師手冊，詳細記載日籍老師來台的篩選辦法和資格，以及對台灣本島師資的培育辦法，各級學制學校的配課，甚至連日語的教授方法都有巨細靡遺的手冊參考，講述詞性、文法的教導順序，寫明板書、教材的利用時機等等，日人的教育是完全的制度化、學理化，治台之初，日人對台灣私塾教育的驚異程度是可以理解的。

2.《楊肇嘉回憶錄》裡，有與張文環〈重荷〉十分相似的制服情結，楊肇嘉回憶自己曾經有過投考國語學校（日語教師養成學校）的念頭：

因為當時公學校的教員一律都是頭戴鑲有金紋的官帽、身穿袖口繡有金紋的制

服、腰際配著刀，走起路來「克察克察」地響，真是神氣十足，令人見了歆羨不置！對於稚氣而單純的孩童，更有著極大的誘惑力（註14）。

## 參、台灣教師與日本教師

將日治時代的學校教師放在殖民的權力結構之下，可以分成台灣教師與日本教師兩類，台、日是民族分野，同時也是地位上支配與被支配的分野。

### 一、日本教師：

有關日本教師的小說有兩篇：呂赫若〈春的呢喃〉（1940）、王昶雄〈奔流〉（1943）

依小說中日人教師對台籍學生的態度分為兩類：

#### （一）對台籍學生無歧視的教師：

呂赫若〈春的呢喃〉：日本音樂學校留學歸國的青年，回想日人音樂老師猛踢腳嚴格教導的情形，聽到彈錯或踩錯踏板時，老師會從起居室衝出來怒吼，如果因驚惶失措而弄錯時，他會更加生氣。然而教學之外，音樂教師與學生閒話家常，師母招待學生的親切態度，以及對畢業學生的出路的關心，都可以藉由小說感受。

#### （二）對台籍學生歧視的教師

日本徵召來台的公務人員，很多都來自偏遠地區，如東北、九州、琉球一帶，有些則是在日本工作不順，希望來台重新發展，這些人員在日本過著不甚舒服或遭歧視的生活，在台灣局勢穩定之後，便開始作威作福、過著愜意的生活，對台灣人民報復似的歧視。

以種族、國族的優越氣燄壓制台籍學

生，以統治、支配階級的角色磨練學生，而不是以教育者的立場教導學生。王昶雄〈奔流〉中的日人教務主任，主角形容他「...頭髮半白的中老年人，微彎的駝背，大概是長久忍受複雜生活的緣故吧。毛毛怔怔地搖動的令人害怕的眼神，卻不能予人和藹的感覺。」在學生劍道大賽前，面對主角禮貌性的問候竟然裝模作樣地大笑回答：「...總之他門全都是膽小如鼠的小伙子，優勝恐怕沒什麼希望吧？...」（註15）。頭髮半白，微彎駝背的中老年人，通常應該予人和藹的感覺，然而教務主任在台地位抬高之後便開始自我膨脹，如厭惡老鼠般睥睨台灣人時，眼神失去老者應有的慈祥，只剩下猙獰，即使是自己教導的學生，也毫不留情的貶嘲。

### 二、台灣教師：

相關的作品為：呂赫若〈鄰居〉（1942）、王昶雄〈奔流〉（1943）以教師的實質皇民化程度分成兩類：

#### （一）皇民化的支配階級教師

王昶雄〈奔流〉裡對教師皇民化後，表裡掙扎衝突的情結，表現得若隱若現，由於時局的壓迫，使得作者的創作意圖不能明朗，現在以新的角度撥去一片片面紗，除去日方的竄改，讓皇民化教師伊東「仿同」、「焦慮」（註16）的矛盾形象更加鮮明。

伊東給人敘事主角第一印象即是：「迫人的凜然」、「個性尊嚴剛強」、儼然一副大和精神，然而臉的輪廓卻不脫是台灣人的特徵。娶日人妻，奉妻母為母，將日本生活和心情完全移植回鄉里，言語行止從根本改變成日人，堂堂在中學教授極為重要的國文，談論日本古典文學、高唱日

本民謠時，臉上充滿光輝，甚至也跟著支配者心態的日人教師歧視台灣學生，即使對不太懂日語的老嫗也不肯用臺語交談，深怕崩解自己假象日人身分；對自己的親生父母加以厭棄，逃避台灣人的血統，逃避台灣人質疑的目光，就連父親去世都不肯妥協回復台灣人的身分，葬禮當場即拋下孤母。似乎毫不猶疑的皇民化行徑之下，卻又透露著些許矛盾：生母來訪時慌張的表現，「呼呼吐著氣，怪尷尬的。看來整個臉上都在忍受著微寒而脫落的感情似的（註 17）。」父親葬禮的當天臉色蒼白毫無光彩，而且在埋葬之後益顯淒慘，落荒而逃似的離開。當學生貧血倒下之時，伊東費心看護，明明對學生充滿關切，殷殷企盼學生的苦練能夠有所成，但在日人教務主任貶謫學生時，又煞有介事的「慎重」附和。這些微妙的情感流露，使得伊東的人格更顯矛盾。

當被學生（表弟）質問：「拋棄親生父母的心情，還能教育人嗎？」伊東十分厭惡的回答：「傻瓜！你怎會知道我的心情，不過，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。...」（註 18）伊東心中的焦慮和扭曲，被坦率的學生逼得更形突兀。小說最後主角看到的伊東：

三十才過三、四的伊東的頭髮，白髮不是佔了三分之二以上了嗎？我頓時不能不想到伊東不為人知的辛勞。線條看來異常粗的，其實不是相當細嗎？

在伊東認為，要成為一個道地的內地人，是要鄉土的土臭完全丟掉，為了這個，連親生的親人也非踩越過去不可。

為了克服「雙鄉」（註 19）生活的苦惱，伊東以激烈的手段摧毀屬於台灣的自

己，好讓自己站在高台灣人一等的階級，然而內心無法觸及的鄉愁，還是將他帶回鄉里居住，煎熬自我的戰鬥讓伊東白髮滿頭。

## （二）未皇民化的被支配階級教師

撇去教師的學校生活、權力結構問題不談，呂赫若的〈鄰居〉將焦點著重在基層台日民眾的相處上。單身住在貧民區附近的國民學校教師，發覺自己的新鄰居竟是一對日人夫婦時，驚得「呆若木雞」，不敢相信日人竟願與台人共處一個屋簷下，「等回過神來，不由得面紅耳赤。內地人（日人）也沒有什麼特別稀奇的地方，聽到內地人就大吃一驚的我實在很可笑。」，但面對前來打招呼的魁梧日本男人，還是嚇得失措，無論日人說什麼，老師都「恍置夢中」頻以「嗨！」回答。之後，老師仍心存餘悸，「充滿與可怕的人為鄰之恐怖感」（註 20），畏懼和日本太太獨處同一屋簷而盡量夜歸，宛如不斷被日本男人容貌可怕的幻影追趕。過了兩、三個月，教師逐漸被日人夫婦的和善感動，了解他們不僅敦睦鄰居，而且愛孩子也如天下父母心，即使是對台灣的孩子也百般愛惜，讓年輕的教師感動莫名，興起為日人奔走之心，求孩子的台灣父母割愛予日人夫婦。

作者雖然沒有陳述教師在工作崗位或是生活上曾經遭受日人欺凌，但從教師最初戒慎恐懼至極的態度，當時台人對日人的普遍隔閡感躍然紙上。〈鄰居〉裡台灣教師的大眾形象，和〈奔流〉中伊東教師的形象相較，同樣是台灣出身，日人在台灣培養和日人在日本培養出來的教師形象竟是如此不同，台灣培養出來的教師不會

有伊東的氣勢，多是〈鄰居〉中淡弱的教師線條，這雖然跟個性、際遇也有關連，但在相同的現實大環境底，如此鮮明一強一弱的形象對比著實耐人尋味。

### 三、小說與現實的對照：

#### (一)關於日人教師的記載：

有關日本教師的記載好壞各半，大體來說，日人教師大多嚴格而認真，但也有故意整肅學生的「皇民急先鋒」教師。

1.《吳三連回憶錄》裡，提到讀公學時印象深刻的事情：

有一位叫三元正雄的老師，對我特別關愛。他認為我應繼續升學，所以主動幫我補習（註21）。

2.《鍾肇政回憶錄》裡，記述淡水中學出名兇惡的「戰鬥艦」教官「比嘉」，據稱是琉球人，有精悍獍猛之氣，擔任體操與教練，而且還兼舍監，是校長特意到內地去物色過來，對學生用皇軍式的訓練、整肅。「比嘉」最大的功用便是：從根底鍛鍊本島子弟的劣根性，使成為本島人「皇民化」的急先鋒。

3.《楊肇嘉回憶錄》提到他快樂的公校生活，對他影響極大的日人校長岡村吉玉，「他為人極好，待學生如待朋友。記得我還曾經爬在他的大腿上，扭著他的鬍子玩，逗得大家歡笑呢！」「岡村校長常常留我在他家裡吃晚飯，我也常常幫他整理庭院...。」「...岡村校長並不是毫無節制地認我胡來的，他是在隨時隨地啟發我的向學和上進之心，每當發現了問題時，就懇切地教導我。」，就連楊肇嘉之後留日的機會，都是岡村校長幫他向養父要求說服而來。

楊肇嘉另外也提到公學校的台、日師

資問題：

我入學的時候，日軍佔據台灣才六七年，那所學校的成立也不過兩年，很多老師都是隨便找來湊數的。至於台灣籍的教師比較起來就差得更遠了（註22）。

#### (二)關於台人教師的記載：

1.《雙鄉記》裡有一段日本留學生葉盛吉的回憶：

幼時在會社的宿舍區渡過了童年，而中學經歷學寮生活的我，從教科書中了解到內地（日本）的風俗習慣，從心中栽種了一個故鄉日本。而孩提時代，那黑暗陳舊的房子，親戚家的婚喪嫁娶，...，還有鄉下廟會的風情，...，小販的叫賣聲，唱戲的喧鬧聲，...，在我心理又塑造出了另一個故鄉。前一個故鄉來自生活，後一個故鄉源自血統和傳統。但我卻不感到有什麼矛盾地兼容並存於心中，真是不可思議（註23）。

不同於教師伊東的矛盾情結，全是正面回憶的雙鄉或許讓許多台灣人毫無矛盾的接受「雙鄉」，但正如作者的不可思議，或許他在某些行為上已透露出矛盾，只是渾然不自覺。

2.《吳新榮回憶錄》中，吳新榮回憶商業專門學校的台籍教師：

這個學校裡有二三十名的教師，其中只有二名台灣人，以外都是日本人，當然他們的教育方針，就是灌注日本精神為唯一的目的。那二個台灣人的教師，僅給他們擔任教育學以外，其他重要的科目都給日本人擔任，...自然地，學生對這二位台灣人的教師特別愛戴，...

吳新榮對其中一位林茂生先生非常敬愛，也受到他不少啟發（註24）。

3.派翠西亞·鶴見的《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》，對日當局的教育方針有許多分析，當時日人對台的教育目的：改造台灣兒童，「給他們說日語的能力是不夠的，更大的目標是：培養日本式的思考和感情，以及培養日本精神」（註 25）但是又不能挑起兒童太多的雄心，使他們服從權威並滿於現狀，以防止反抗；優秀的學生被「精心」導入總督府急於普及於台灣人的行業：教學和行醫（註 26）。

如此的教育方針下培育出來的教師，難有〈奔流〉中伊東教師的形象和資格，但很類似呂赫若〈鄰居〉、〈藍衣少女〉裡台灣教師的孱弱。

## 肆、男教師與女教師

以最原始性別觀點將小說裡的教師形象分成男女兩類，原本希望能對比男女教師教學、人生課題上的差異，但由於女性資料缺乏，只能從生活情感的觀點切入：

### 一、男教師

選取有女性角色與男教師相對的文本，包括楊守愚的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（1931）、〈啊！稿費？〉（1931）、〈退學的狂潮〉（1984）、呂赫若〈藍衣少女〉（1940）、〈春的呢喃〉（1940）、〈鄰居〉（1942）

#### （一）養家活口的居家男人

楊守愚的〈就試試文學家生活的味道吧〉、〈啊！稿費？〉、〈退學的狂潮〉，這系列裡的書房王先生，在書房開課教書、商業投資、寫新小說，所有的憂慮辛勞都是為了養家活口，唯一的享受只是買支煙抽；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子兒女；當書房學

生一個個短欠束脩離開，稿費微薄，欠債纍纍時，妻子怒罵、小孩哭叫向爸爸要東西吃的聲音便響徹耳際，將王先生壓得無法喘息，雖是教師，實際上卻是為生活所苦的居家男人。

#### （二）謹言慎行的獨身男性

呂赫若〈鄰居〉中將獨身年輕的男教師，塑造成教養良好，有君子風度，十分符合教師形象的男性。每與鄰居的日本夫人見面，「...在是他人妻子的意識下，我對夫人敬而遠之，遇見時，垂下視線，只作普通的招呼。」面對夫人親切的詢問有無需要清洗的衣物，只是三緘其口（註 27）。

#### （三）為理想犧牲家庭的男教師

呂赫若〈藍衣少女〉之中為追求繪畫理想的年輕男教師，希望妻子能自力更生，因此從微薄的教書薪水中寄出生活費，讓妻子遠赴東京學習洋裁。「依據他個人的想法，不想讓作畫、與金錢絕緣的黯淡前途，牽連到家人（註 28）。」教師為追求理想而犧牲家庭的團聚，結果卻因以女學生為模特兒作畫的風波，讓理想也瀕臨毀滅。

#### （四）喜教女學生的男教師

呂赫若〈春的呢喃〉將拿女學生沒輒的男音樂老師刻畫得十分有趣，不但沒有衝出起居室對踩錯踏板的女學生開罵，對於女學生的無禮舉動也不以為意，女學生撒嬌時，男老師也只能笑著接受請求；替男主角盤算職業時，一面看著女學生的臉開懷笑著，一面對男主角說：「教女孩子音樂嘛！」與男主角記憶中十分嚴厲的音樂老師形象大相逕庭。

### 二、女教師

有關女教師的資料非常稀少，不論是在小說文本或是史實的相關記載、回憶錄等等，幾乎都難尋蛛絲馬跡，如此的跡象可以將他歸因為時代的問題，二十世紀初期的女性，受教育的機會難得，出外拋頭露面工作的機會更難，高等女校、師範學校、留學學歷等等，都是一只嫁妝，而不是找工作的憑據。

這樣的社會背景底下，到底是什麼樣的女性得以高學歷辛勤工作，以換取低於男性的酬勞？在日治時代小說所能找到的文本只有朱點人的〈紀念樹〉（1934）以一位女教師在病榻上的回憶為主軸，內容多是關於情感、遇人不淑的敘述。自由戀愛結婚的女教師，將辛勞工作的薪資貼補夫家，等到自己得了肺結核不能工作，才發覺丈夫只是看上她有賺錢能力才向她求愛，最後只能在病榻上孤獨懺悔自己過去的戀情。

高等女校畢業、任教育公職、自由戀愛結婚的主角，不同於傳統女性的低學歷、或者高學歷嫁妝、媒妁之合，完全是構成時代尖端女性的條件，然而她的下場並不比一般的傳統女性幸福，依然受夫家壓榨勞力，利用過度之後便予以無情拋棄，受到委屈卻無力反擊的女教師，也只能如傳統婦人般奔回娘家依靠。

女教師在歷經打擊之後，不斷自我反省，做出堅強的決定：

我有那些收入儘可自作自給，那有同棲的必要呢？...只要我的身體能夠恢復，失了位子亦不算什麼的！只要我的身體能夠健康，我就做了職業婦人亦足以自活的（註29）！

女權意識至此稍見抬頭，女教師自覺

能夠自力更生，何必倚賴不可靠的婚姻？何須屈服於丈夫公婆？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力才是真實的正義。

作者塑造倍受夫家欺壓的女教師，希望為女性發生表達社會的不公平，有初步啟發女性自覺的意圖。

### 三、小說與現實的對照

從史料中男女教師的比例以及薪資比的數據，可以進一步瞭解當時男女教師的地位落差，在〈紀念樹〉寫成的前一年，1933年的日本男性公學校教師台灣 2165 人，女性 464 人；台灣男性教師 2817 人，女性 317 人（註30）。以比例來說，日籍男女教師比為 4：1；台籍男女教師比則差距至 8：1，陽盛陰衰的情況一直到近年才有局勢逆轉的情形。薪資不公平的情況更是嚴重，日籍男教師每月在 25 元以上，女教師 10-20 元；台籍男教師約 8 元，女教師 3-10 元（註31）。

對學童付出相同的勞力，待遇卻差別如此之大，日人的性別歧視再加上種族歧視，層層壓疊，將女教師壓榨在最底層。

### 伍、結論：時代變遷與教師形象

教師形象因時代的變遷每有不同，從教祖孔老夫子到當今的新人類教師，都是社會猛烈變遷下的產物；當社會發生變動，教師便必須自己調整步伐，思考如何引領學生適應抑或對抗潮流，然而這其中又牽扯到極為複雜的政權問題，教師必須使用符合政權立場的教材、進行體制內教學，古今中外皆然；每當政權移轉，教育立場便跟著起舞，教科書的選材以及書寫立場、教育制度、師資培育條件，從上而下

都必須不論艱難的改制，以符合國家政令。

日治時代的台灣教育變遷帶有強大的毀滅性，幾欲將傳統、落後的教育制度連同台灣人的民族精神一併拔起，日人所帶來的現代化和現代思想，不斷衝擊台灣的本土文化。日人所帶來的教師、培育的新台灣人，又努力再以日本精神改造下一代，台、日教師都成了殖民教育先鋒者，這造成了日治時期教師的共同時代課題——同化與戰爭，日人統治初期的同化，包含著精神上的戰鬥以及血肉上的戰鬥，在同化台人的同時，還必須肩負與台人戰鬥的風險，而台人教師則面臨自身同化與同化台人之苦；統治後期日人在亞洲各地掀起爭戰，台、日教師都得面對徵調戰區的危險，台籍教師面對更大的壓力，不是被迫與祖國對戰便是強裝大和魂魄帶領學生為日人建設。

所不同的是，轉變生活環境的日人負責接受優渥新天地，死亡率甚至逐漸低過日本內地（註 32），而在地的台灣教師卻要遭受各種時代課題的同時挑戰。台籍教師特有的時代課題有三：

### 一、新舊文化遮嬭

傳統教師面臨失業與新社會批判，新教師則必須無條件接受日式新文化，並負責教育給下一代；社會知識水準的落差加大，城鄉差距、世代衝突與隔閡驟增，更加重教師的責任。

### 二、國族認同迷惘

教師身為殖民教育先鋒，成為日本政府首要皇民化目標，教師們即使心理不認同，但為求生活仍必須作好表面的工作，對學生進行日本精神式的薰陶和皇軍式管

教，長期的表裡不一和心理壓抑，形成國別與族別認同困窘，使得原本的國族認同遭到扭曲錯亂。

### 三、殖民社會壓迫

除了和一般民眾共同的殖民社會壓迫，學校機構本身也存在殖民結構壓迫，日人教師的薪資高出台人教師三倍以上，除行政職務之外，重要科目和高年級教育也都以日人教師為主，身為教育者的台人教師得時常面對日人的思想檢驗，卻沒有在會議發言的資格，高級教育官員可以當著全校師生辱打台籍教師，在管理上，台人教師被壓迫於壓迫台人子弟，備嘗夾於政權與民族衝突間的苦痛。

這些因時代變遷而起的課題，可以在不少小說作品中得到印證，尤其是戰後出現的反日文學作品，作家不再受政治侷囿盡能暢所欲言，也不用蒙以偽裝，角色的形象描寫更加鮮活；與日治時期小說裡作家掙扎與角色掙扎錯綜，場景氣氛陰鬱委婉、角色個性若隱若現的壓抑風格截然不同，然而日治時代的大量作品，仍舊值得現代研究者繼續探索，慢慢咀嚼出小說裡的深沈時代厚味。

## 附 註

註 1 張恆豪編，台灣作家全集—短篇小說卷／日據時代·楊守愚集（前衛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196。

註 2 張恆豪編，台灣作家全集—短篇小說卷／日據時代·張文環集（前衛出版社，1994 年 7 月出版），頁 119-120。

註 3 同註 2，頁 129。

- 註 4 同註 1，頁 178。
- 註 5 同註 2，頁 51。
- 註 6 呂赫若著、林至潔譯，呂赫若小說全集（台北，聯合文學，1996 年），頁 184。
- 註 7 同註 6，頁 183。
- 註 8 如鍾理和的原鄉人（1959）裡敘述「原鄉」來的諸位私塾先生教學用心。
- 註 9 台灣教育會，台灣教育沿革志·第七編私立學校（1940 年），頁 967。
- 註 10 同註 9，頁 968。
- 註 11 見張深切全集—里程碑（台北，文經出版社，1998 年），頁 81-82。
- 註 12 同註 9，頁 985-986。1899 年日人調查，書房 1707 所，學生 29941 人，1940 年書房只剩 17 所，學生 996 人。
- 註 13 見吳三連回憶錄（台北，自立晚報，1991 年 12 月出版），頁 24。
- 註 14 見楊肇嘉回憶錄（台北，三民書局，1977 年），頁 32。
- 註 15 張恆豪編，台灣作家全集—短篇小說卷／日據時代·翁鬧、巫永福、王昶雄合集（前衛出版社，1994 年），頁 348。
- 註 16 取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，「仿同」指以日本為祖國的仿效情結；「焦慮」指伊東因可以預期的皇民化困窘，產生總總不自然行為。
- 註 17 同註 15，頁 337。
- 註 18 同註 15，頁 352。
- 註 19 取自楊威理著、陳映真譯，雙鄉記。
- 註 20 同註 6，頁 284-286。
- 註 21 同註 13，頁 26。
- 註 22 同註 14，頁 29-34。
- 註 23 同註 19，頁 17。
- 註 24 見吳新榮回憶錄（台北，前衛，1991 年 6 月），頁 93。
- 註 25 台灣總督府，國語教授書一（台北，台灣總督府，1941 年），頁 5。
- 註 26 見派翠西亞·鶴見著，林正芳譯，日治時期台灣教育史（財團法人仰山文化基金會，1999 年），頁 19。
- 註 27 同註 6，頁 286。
- 註 28 同註 27，頁 186。
- 註 29 張恆豪編，台灣作家全集—短篇小說卷／日據時代·朱點人、王詩琅合集（前衛出版社，1994 年 7 月），頁 176。
- 註 30 同註 26，頁 93。
- 註 31 同註 26，頁 240。
- 註 32 見矢內原忠雄著、周憲文譯，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（海峽學術，1999 年 10 月），頁 155。